

1994年4月6日,在非洲小国卢旺达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从这一天开始,该国胡图族人展开了针对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三个月之内,80万-100万人丧生,这个国家的人口减少了九分之一还多。

到今年4月,卢旺达大屠杀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周年,但是人们心中的伤痛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如果记忆可以选择,当年的亲历者一定会选择忘却;但记忆是不可以选择的,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扒开自己心灵深处的伤口,在痛苦中回忆那段可怕的经历。

记忆是为了忘却,回首是为了新生。但愿有一天,多苦难难的卢旺达人能够得到灵魂的解脱。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 想要忘却

### 乔纳森·恩图罗(一家14口只有5人幸存):想要尘封那段痛苦记忆



恩图罗在穆拉比

他们寡不敌众。最后,包括恩图罗在内大约有100名难民奇迹般地逃脱了,他们跑到山谷中,游过穆拉比河。

恩图罗在对面山坡上的香蕉林里躲了好几个小时,至少有40000人死在穆拉比,这堪称是整个卢旺达种族屠杀中最可怕的一幕。时至今日,这里依然会不时发现人的骨骸。

“全国性的屠杀开始时,我父亲不相信这是真的,”恩图罗回忆道,“直到我们地区的村庄被焚烧,我的三个兄弟姐妹被杀害,我们一家子才逃到穆拉比。”1994年4月10日下午4点,他们逃到了自以为相对安全的避风港。

避风港其实一点都不安全,4月21日凌晨3点,穆拉比的屠杀开始了。恩图罗说,突然之间,士兵朝人群扫射,并且扔手榴弹。一个小时后,民兵从四周的山上强行进入营地,开始“系统地”屠杀无助的难民,他们用砍刀、匕首、长矛、镰刀、锄头以及棍棒屠杀手无寸铁的难民。

恩图罗的家人在混乱中分散了。恩图罗加入了一群年轻人中拼死抵抗,他们利用工地现场的砖头与凶徒搏斗,但是,

穆拉比的白骨



法国曾和胡图族政权保持亲密的友谊,法国不仅为胡图族政权提供武器,还派出军事顾问帮他们训练民兵。当大屠杀结束之后,法国也派出了“拯救行动小组”前往卢旺达,执行所谓“绿松石计划”。他们建立了一条“安全走廊”,帮助包括成千上万胡图族人在内的难民逃往卢旺达的邻国布隆迪或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

离开穆拉比的纪念馆,恩图罗想去加塔巴,他的父亲和兄弟就在那里被打死。他们好不容易从穆拉比逃出来,但只逃到了下一个山头的小村子里。他们遇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那个男子的车上放着一把崭新的砍刀,砍刀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

恩图罗怎么也忘不掉,就在那个卖牛羊肉的市场,四名男子将他的父亲和兄弟殴打致死。他们当中领头的是一个富裕的商人,此人现在正在监狱里服刑,他的妻子经营着店铺。今天在加塔巴,当年的凶徒和受害者比邻而居。

恩图罗打算和那个凶手的老婆谈谈,但当经过那个女人的店铺门口时,恩图罗动摇了。“不,今天不行,”他说,“心情很奇怪。”事实上,当他经过村里的广场时,村民们一直用满含敌意的眼神盯着他乘坐的越野车。村民们想说的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可以读出来——那个家伙带着记者来了,又想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就让它过去吧!

在回基加利的路上,恩图罗看到囚犯在稻田里劳动。普通犯人穿着粉红色的囚服,而那些穿着鲜艳的橙色囚服的犯人则是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人。“就应该让人人都看到,他们是‘种族灭绝’罪犯,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这就是正义。”恩图罗说。

恩图罗的家庭是个有14口人的大家庭,如今只剩下5人,除了恩图罗自己,他的母亲、两个姐妹以及一个兄弟从大屠杀中幸存。经常有人邀请他到穆拉比担任导游,但都被他拒绝了。他在自己周围建起了一堵高高的“保护墙”,只要一回到穆拉比这个死亡之地,这堵保护墙就会坍塌。他摆脱痛苦回忆的方法就是通过努力地工作和事业上的成功去压制它。他在布塔雷大学学习商务和金融管理,他在一个援助组织找到了一份工作,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他在基加利一个人住。他不希望自己的身份被定格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希望那段记忆被永久“尘封”起来。



内拉巴祖古在她现在居住的小黑屋中

### 无法忘却 丹西尔·内拉巴祖古(失去20个家庭成员):我的时间仍停留在1994年

恩图罗想尽快忘掉那段痛苦的回忆,但有些卢旺达人始终无法走出那段痛苦的回忆,其中包括丹西尔·内拉巴祖古。她说,她的时间仍然停留在1994年。每天,痛苦的记忆都在提醒她发生在恩塔拉马教堂的大屠杀,教堂离她当年居住的小屋不远。她失去了20个家庭成员,其中包括她9个孩子中的5个,她的丈夫就被砍死在教堂的祭坛前。

已经61岁的内拉巴祖古现在和一个儿子、两个孙子一起住在两间小小的黑屋子里,屋子里没有桌椅,也没有电和自来水,屋子的外面有一小块菜地。为了生存,内拉巴祖古每天都要到工地上拖石头,一天活干下来,衣服被刮得破破烂烂,报酬还不到1欧元。

恩塔拉马在布格塞拉区,那里沼泽密布,土地荒凉,最恶的特产就是蚊子。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波屠杀后,很多图西族人逃离或被迫搬迁。1994年4月开始又一波大屠杀后,图西族人几乎就从那里绝迹了。在胡图族人的眼里,图西族人像害虫一样被消灭了。

1994年屠杀开始后,成千上万的图西族人从周边地区逃到恩塔拉马的教堂,他们希望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能得到保护。内拉巴祖古和她的家人就在其中。但在4月15日上午8时,民兵包围了这里,他们在教堂的外墙上扒了很多洞,然后把手榴弹从这些洞里塞进教堂,一阵巨响过后,他们冲进教堂,杀害那些仍然活着的人。

教堂成了一个又大又黑的“沼泽”,只不过沼泽里流淌的不是污水,而是受害者的鲜血。如今,教堂正面的墙壁依然屹立在那里,一根木棍斜靠在墙角。内拉巴祖古说:“他们用那根木棍刺进女人的下体,从头顶穿出,然后把人放在火上烤,就像烤肉串。”说这些时,内拉巴祖古的声音分外平静,就好像她不曾亲眼目睹这一幕惨剧似的,可事实上,那恐怖的场景已经永远地印刻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内拉巴祖古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同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她无法对如此野蛮的行为做出解释。是啊,一个人怎么能解释医生为什么杀死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教师为什么屠杀学生、修女为什么浇上汽油焚烧教友呢?

“继续!坟墓还没有装满!”空中传来国家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那是对暴徒发出的指令。杀人成了普通百姓的义务,面对权威,他们唯有服从和遵守。他们继续杀戮,恐惧、仇恨和嗜血的本能推动他们去杀戮,对受害者财产的贪图更是他们疯狂杀戮的动力。

内拉巴祖古那年41岁,身上还怀着儿子埃里克,她藏在死人堆里才侥幸逃生,当年6月,埃里克出生。



恩塔拉马教堂的白骨

## 不该忘却

### 巴托洛茅斯·格里尔(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对卢旺达大屠杀的报道是我永远的耻辱

1994年4月6日晚上8点20分,一架载有时任卢旺达总统朱纳尔·哈比亚利马纳的飞机在抵达首都基加利机场时被击落,这一事件的真相到今天依然是个谜,但很明显,总统被暗杀标志着大屠杀的开始。当天晚上,总统卫队和胡图族军事组织“联攻派”民兵开始在基加利的街头杀人放火,一群狂热的胡图族人夺取了政权,并决定消灭占卢旺达人人口14%的少数民族图西族,以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一个星期之内,暴力冲突席卷全国。

当天晚上10点半,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加拿大中将罗密欧·达莱尔给纽约运转中心打了电话,达莱尔是卢旺达联合国援助团的负责人,援助团的任务是维持脆弱的和平,让卢旺达能够根据1993年签订的阿鲁沙协议顺利进行大选。

达莱尔几个月前就发出了卢旺达可能暴力升级的可怕警告。1994年1月,他发现了一个储藏武器的秘密地点,并且破译了一份密电,密电提到了“敢死队”的存在。现在,维和部队可能遇到的最坏状况已经变为现实,达莱尔要求立即增援,他认为4000人的维和部队和充分的授权可以阻止灾难的发生。但是他的上司、后来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拒绝了他的请求。联合国的官员们不相信卢旺达正在发生一起反人类的罪行。

接下来的3个月,胡图族政权及其团伙一共杀害了80万-100万图西族人和比较温和的胡图族人,平均每5分钟杀死1人。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的凶手杀死这么多人的记录。罗密欧·达莱尔将这次惨案定性为“非洲大屠杀”。

伊薇特(大屠杀后成长起来的卢旺达妇女):看不到改善生活的希望

伊薇特(大屠杀后成长起来的卢旺达妇女):看不到改善生活的希望

图西族人保罗·卡加梅终止了20年前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1994年6月他率领的图西族武装推翻了胡图族政府,终结了那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从那以后,卡加梅成为了卢旺达的总统,直到今天。

上任之后,卡加梅下令禁止人们再议论有关大屠杀的事情,实行民族和解。他希望卢旺达人能够忘却痛苦过去,一心奔向美好的新生活。卡加梅政府的一系列大胆政策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他的既定目标是到2020年将卢旺达变成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他的领导下,卢旺达重组了农业部门,投入巨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与外国投资者合作,卢旺达的GDP增长速度惊人。首都基加利的人口已近百万,豪华的咖啡馆和顶级的酒店随处可见,每天早晨都有妇女清扫大街,保持城市的整洁。由于显而易见的进步,基加利已经被称为“非洲最干净的地方”。

除了发展经济,提高妇女地位是卡加梅政府优先考虑的事项之一,政府已经制订了很多旨在促进妇女融入社会的政策,其中不少已经起了作用。卢旺达的小学中女孩比男孩多;卢旺达国民议会中,64%的议员为女性,这一比率全球最高。看上去,卢旺达妇女的地位在节节升高……

但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基加利定期有武装保安人员巡查,以确保城市安全;在很多商铺的门口有成群的青年男子在闲逛,他们都是失业青年;而在拥挤的市场或公交车站,这些失业青年在拼命乞求得到一份工作。

但是,这场大屠杀刚刚开始之时并没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很多人将其视为一次普通的种族冲突,这种种族冲突在非洲大陆上无处不在,而且没完没了。

持有这种看法的并不仅是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很多新闻记者也是这样看的,现在供职于德国《明镜》周刊的巴托洛茅斯·格里尔就是持这种观点的记者之一。

1994年4月,还供职于德国《时代周报》的格里尔正在南非采访,当时南非正在举行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第一次大选,纳尔逊·曼德拉很可能当选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全世界的记者都聚集到了南非,等待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4月16日,第一次传来了位于南非以北4000公里的卢旺达的消息:战乱、血腥冲突、种族纷争、兄弟阋墙……这一切符合典型的非洲“部落战争”的特征。得到消息后,格里尔的一个英国同事感叹道:“卢旺达?哦,这只是图西族和胡图族互相在砸对方的脑袋,无休无止的部族战争啊!”

事实上,发生在卢旺达的凶残暴行和“部族战争”一点关系也没有。很多世纪以来,胡图族和图西族有共同的语言、习俗和文化,他们互通婚嫁,很多卢旺达人根本无法分辨谁是胡图族人,谁是图西族人。悲剧发生的原因与部族矛盾一点关系也没有,得从其他方面寻找答案。卢旺达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稀缺,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却面临人口过剩的威胁,经济上的不发达和生存的威胁催生了统治精英对权力的渴望和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动力。

今天的穆拉比建成了一座国家纪念馆,那所未竣工的高中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纪念馆的一块信息板上写道:“媒体没有报道这里发生了大屠杀,只说这里爆发了部族战争。”卢旺达没有忘记大屠杀发生时,全球媒体做出了怎样的“天真”报道。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

男人没有工作,女人就业更难。很多女人拎着篮子在路边卖蔬菜水果,但这是非法的,看到警察就逃走。

伊薇特(化名)是一个24岁的摊贩,生活在基加利的贫民区。小时候,她曾梦想成为“一个领袖、一个政府部长”。可是命运并没有按照她设想的那样发展,在进入中学的第一年,她就被迫辍学了,家里再也交不起她的学费。几年后,她结了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政府不断鼓励大家自主创业,于是伊薇特打算做点生意。“我希望能够支付我的孩子的教育费用,让他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伊薇特说。

由于无法承担市场摊位的租金,伊薇特决定在路边卖甘蔗和木薯根。

电视上最初报道此事时的论调也让人很不舒服,评论员将如此可怕和不可思议的大屠杀说成是“人性偏差”或“杀戮病”,听起来就像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应该归咎于一种“阴险”的病毒一样。

今天我们知道,种族灭绝并不是古老的、权力无序的产物,而是一群受过教育的现代精英利用高度组织的国家工具进行的恶行。军队和警察、情报部门和民兵、政府官僚和大众媒体,统统都是屠杀的工具。凶手是有组织的体系,他们奉行一个简单的种族灭绝逻辑;如果我们胡图族人不消灭图西族人,那么图西族人就会消灭胡图族人。

时至今日,巴托洛茅斯·格里尔依然对当年自己的颠沛耿耿于怀。当年的格里尔一心到南非抓“大新闻”,对卢旺达发生的事情只是做出一些陈词滥调的报道。

1994年4月,恩塔拉马正在进行血腥屠杀,格里尔却在4000公里之外的南非很快地写了一篇报道发在德国《时代周报》上。格里尔在报道中写道:中部非洲正在进行一场可怕的“部族战争”,每个人都在和别人战斗,外国的干预是毫无意义的。格里尔认为,这篇报道是他职业生涯中犯过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是他一生的耻辱。

今天的穆拉比建成了一座国家纪念馆,那所未竣工的高中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來。纪念馆的一块信息板上写道:“媒体没有报道这里发生了大屠杀,只说这里爆发了部族战争。”卢旺达没有忘记大屠杀发生时,全球媒体做出了怎样的“天真”报道。